

大国视角下新中国工业70年述论*

肖翔 武力

[摘要]新中国立足大国国情,对工业化进行了70年的探索,使中国完成了从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变。未来中国要完成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升级仍然任重道远。通过回顾新中国工业发展70年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出独特的逻辑与启示:大国国情要求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发展中大国特征使得中国工业化具有赶超的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工业赶超的独特优势;中国工业发展需要发挥好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大国工业发展要处理好区域之间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注重在国际舞台上利用好大国独特的政治优势,为工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关键词]大国;新中国;工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273(2019)08-0045-08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尤其对于大国来说,工业水平高低不仅直接影响其经济发展,而且事关大国的国家安全。中国虽然在古代曾经达到农业文明的高峰,但是由于在近代错过工业革命的历史契机,在近代以来的大国竞争中长期处于劣势。1949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经过70年的努力从农业大国转变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成为“世界工厂”。虽然在2020年中国即将基本完成工业化,但正如习近平强调的“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1]工业作为中国实体经济的核心,未来仍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具有自身的特点。本文拟从中国作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这个视角,梳理新中国工业发展70年的历程,并为新时代工业经济发展提供历史启示。

一、中国工业发展的大国国情

习近平指出:“我国是一个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2](p.97)]复杂的大国国情对新中国70年的工

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从以下五方面来理解。

一是人口众多与多民族。人口是衡量大国的重要指标。^①中国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具有巨大国内市场潜力、劳动力丰富、规模经济等优势。人口众多还使中国公共品(包括铁路、国家安全等)、工业的基础与关键领域投入的人均成本较低。与世界大多数人口大国类似,中国具有多民族的特征。中国多民族又表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少数民族主要集中在西部及边疆地区。如何实现大国工业化中的区域协调,不仅关系到经济发展,还事关民族团结。

二是国土面积大与资源分布不均衡。毛泽东指出:“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3](p.32)]中国国土面积辽阔,中央政府在推动工业发展过程中面临治理成本较高的问题,需要发挥好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国又是一个资源分布不均衡的大国,按照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以瑗珲—腾冲作为分界线,该线南方占全国国土面积43.8%,总人口则为94.1%。中国80%的矿产资源分布在西北地区,石油与

*本文系中央财经大学青年英才培育计划项目“中国共产党与大国赶超的历史分析”[QYP1805]、中央财经大学教师“思政+”专项基金[SZJ1907]阶段性成果。

作者:肖翔,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武力,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①依据库兹涅茨(1989)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中的定义,人口1000万以上就可以定义为大国,钱纳里(1989)在《发展的格局:1950—1970》则将人口在2000万以上作为大国。欧阳峤(2014)在《大国经济发展理论》中综合人口、国土与国内总产值,将4000万人口作为大国的标准。

煤炭的75%以上则分布在长江以北。^[4]

三是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资源不足。中国资源、能源种类丰富,许多金属矿、非金属矿的储量位居世界前列。这为中国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但中国人均资源不足,人均矿产储量潜在价值为1.51万美元,仅达世界平均水平的58%;石油、铁矿等重要矿产人均占有量分别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1%、44%。^[5]中国工业发展过程中需要克服人均资源不足的制约。

四是发展中国家。由于错失两次工业革命的契机,近代中国一度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先发工业国争夺的产品市场与原料产地。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工业发展一方面要加快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与强大的国防工业,尽快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另一方面可以抓住“后发优势”,通过吸收世界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推动工业实现赶超。

五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大国国际地位。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可以有效集中大国有限资源,在工业关键领域与环节取得重要突破。中国共产党长期的执政地位,使其可以总揽全局,从长期发展的角度规划工业化战略。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我们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6]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需要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要巩固大国的国际地位离不开强大的工业基础,而国际格局又对中国工业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探索 (1949—1978)

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国家安全和高积累下社会稳定的需要,中国选择了与我国要素禀赋不符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重工业取得较快发展,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但是从整体来看,工业化任务依旧艰巨。

(一)为什么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

首先,保障国家安全需要强大的重工业。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要来欺侮我们

的。”^{[7](p.705)}近代中国百年落后挨打的历史教训和新中国成立后严峻的国际形势,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强大的国防工业,国家安全将受到严峻的挑战。国防工业的发展又需要包括机械、钢铁、能源在内的强大的重工业支撑。

其次,薄弱的重工业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重工业发展的落后不仅使得我国国家安全难以保障,还导致我国农业、轻工业难以得到有效的提高。当时估算如果全国人民每人要多做一套衣服,就要多生产出9000万匹布,就得建设有10万锭子的大纺织厂27个,这27个纺织厂所需的纺纱机和织布机,要由9个年产30万纱锭的纺织机械制造厂来生产。^{[8](p.12)}

再次,“一边倒”与苏联工业化的“示范效应”。新中国成立之日,正是东西方冷战升级、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尖锐对立之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我国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与此同时苏联又答应全面援助中国的工业化。而立国内积累,通过计划经济实现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苏联模式”,为中国提供了较强的“示范效应”。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道路。

(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与优先发展重工业道路的探索

一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重工业与轻工业不同,它的建设周期长、资本投入大、技术要求高。为克服市场机制与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之间的矛盾,在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我国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向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过渡。到1956年底,我国就基本建立起了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不仅使资源最大限度地集中在政府手中,而且实行生活资料的平均分配,从而保证了高积累政策下的社会稳定。从工业生产的角度看,政府以行政方式,采取指令性计划管理为主的方式,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办法,制定计划并层层下达,企业则是在国家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的基础上,制定和实施经过上级批准的自己的计划。

在这个体制下,企业的自主权很小,发展规划、具体的生产计划以及人财物管理都由上

级部门统一掌握和调度。计划分配调拨为主的物资流通体制把全国视同一个大工厂,生产资料的流通,特别是国营企业之间的流通,是大工厂内部的调拨,价值规律对生产资料的生产 and 流通,都不起调节作用。^{[9](p.7)}随着物资的计划调拨体系建立,价格也从资源配置的手段向核算工具转变,形成了计划价格机制。

二是计划经济体制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提供了制度保障。计划经济体制克服了优先发展重工业道路中资本稀缺与技术落后的瓶颈。1953—1978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通过“统购统销”获取农业剩余达2800亿元,为当时农业收入的17%;^[10]我国还压低了城市居民的消费。通过实现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条件下的高积累,我国突破了工业化中资本稀缺带来的“贫困性陷阱”。^①中国政府还集中力量进行了“156”项、“四三方案”为代表的大规模技术引进,推动了技术赶超。这一时期我国技术进步还具有“资本体现式”的特点,技术进步内嵌于投资中,大规模投资有效提升了工业的技术水平。

计划经济体制保证了有限资源向具有较强外部性的重工业集中。例如“一五计划”的“156”项中(实际开工的150项),能源工业数目为52项、冶金工业为20项、机械工业为24项,军事工业为44项,轻工业和医药工业仅为3项。^{[11](p.75)}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我国政府还对内地丰富的资源、能源进行了有效开发。苏联援建的“156”项中,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遍布东北、中、西部地区;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政府推动了东北、上海等工业基础较好地区大批工厂迁往内地,改善了大国工业布局,巩固了国家安全。特别是“两弹一星”和核潜艇等高端技术发展和国防工业的建立,使得中国打破了外部的“核威胁”。

此外,计划经济体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历史局限逐渐显现。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在保证有效快速发展重工业和“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确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随着现代经济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计划经济体制运行效率问题也日益凸显。从宏观上来看,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政府替代市场成为工业发展近乎唯一

的主体。追求重工业快速发展的偏好及其宏观判断失误将带来工业发展速度过快,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大跃进”、文革时期的“三个突破”(职工人数突破5000万人、工资支出突破300亿元、粮食销量突破800亿斤)都是典型的例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地方政府不负责全国的物资平衡,为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的经济放权反而加剧了经济混乱。从微观角度来讲,为确保优先发展重工业,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改造并建立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存在的“预算软约束”,不仅导致了“投资饥渴症”,加剧了我国经济紧张;而且体现出其生产效率也有待提高。由于未能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框架,我国更多采取精神激励和政治高压来克服生产低效率,但这些努力也存在“边际报酬递减”的问题,最终导致工业发展的活力下降。

在优先发展重工业道路下,通过20多年的努力,从整体来看中国工业产值取得了较快增长。1952年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为20.9%,1978年为48.2%。重工业取得长足进步,1952年轻重工业比重为64.4:35.6,1978年为42.7:57.3。但我国工业化任务仍然艰巨,即使与发展中大国相比,196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是印度、巴西的332.6%、549.7%,1978年则下降为199.4%、100%。由于重工业对于就业的吸纳有限,1978年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为17.3%,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则为70.5%。^②中国仍然未能完成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

三、改革开放与工业化快速推进 (1979—1997)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从优先重工业发展向农、轻、重协调发展的工业化道路转变。邓小平强调:“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12](p.377)}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中国工业化快速推进。

(一)“放权让利”与工业化

改革开放之初,国有经济是工业生产的主要力量。如何激活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是当时我国经济面临的重要难题。1978年10月,四

^① 纳克斯归纳了贫困循环,即从供给来看“低收入—低储蓄水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而从需求上看,存在“低收入—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收入”。

^② 笔者综合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

川省率先进行了“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13](p.19)}1986年我国开始实行“包死基数、确保上缴、超收多留、欠收自补”为特点的“承包制”改革。经推广,到1987年底,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中77.6%实行成本经营责任制。^{[14](p.359)}“承包制”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有工业企业的效率。但“承包制”不仅助长了企业的短期行为,而且随着竞争日益激烈,一些企业无法完成上缴任务。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化的企业制度,并将“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概括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化。

这一时期我国还向市场放权,非国有企业发展迅速,成为推动工业化的重要动力。在经济短缺的条件下,乡镇企业其产品低廉的价格适应了市场需求,发展迅速。1980年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比重仅为9.7%,1984年上升为16.4%,1987年则上升到26.7%。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肯定“乡镇企业异军突起”,^{[12](p.376)}乡镇企业再次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三资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长足发展。198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承认了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15](p.1284)}1992年党的十四大进一步明确了“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16](p.19)}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17](p.1128)}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为工业化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三资企业”大多进入投资少、盈利高的轻工业部门,有效改善了工业结构。

(二)“双轨制”改革与工业发展

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入,大国经济活动日益复杂,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面临的信息不对称日益严重,政府失灵加剧。价格机制作为市场机制的核心,成为改革的重点。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18](p.570)}1984年5月,国务院第一次正式明确工业生产资料生产企业超产部分允许自销,价格在国家牌价上下可以浮动20%。1985年1月,我国政府取消企业自销产品价格加价20%的限制。在轻工业

产品逐步放开之后,重工业品价格改革进入以“放”为主的“双轨制”改革阶段。

价格“双轨制”一方面通过“计划轨”维持了旧有工业经济体系的运行,另一方面通过“市场轨”给非国有经济壮大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在市场价格高于计划价格的背景下,担负计划生产任务的国有企业也有强烈动力扩大市场部分的供给,进一步推动了工业生产的扩张。但价格“双轨制”在运行中也出现了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轨差”不断拉大的问题。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价格改革是市场发育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19](p.229)}1992年以后价格改革步伐加速。截止到1996年,国家工业指令性计划产品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仅约为4%,国家计划调拨的重工业生产资料仅占市场销售总额的比重约为5%。^{[20](p.768)}价格改革的深入,使得市场逐步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三)对外开放与工业化

大国独特的回旋余地,让中国可以采取“以点带面”的方式梯度开放。1979年国务院批准广东省和福建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率先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的管理办法。1980年5月16日,中央决定在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厦门市试办经济特区。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把对外开放确定为“长期的基本国策”。1984年5月,中央决定开放沿海的天津、上海、大连等14个港口工业城市。1985年2月,中央决定开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东南三角地区为沿海经济开放区。^{[21](p.10)}1988年我国进一步在海南建省,成立新的经济特区。1991年在上海外高桥、深圳福田、天津港等沿海重要港口设立保税区。^{[22](p.37)}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中国逐渐融入国际市场,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逐步凸显,中国出口取得较快增长。1984年中国出口额位居世界第18位,1997年上升到第10位。^{[23](p.22)}邓小平指出:“我国的对外开放、吸收外资的政策是一项长期持久的政策。”^[24]1983年我国吸引外资仅为19.81亿元,而1997年我国吸引外资则达644.08亿元。^{[23](p.282)}外资流入不仅弥补了我国工业化中资本不足的缺陷;还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模式,提高了中国工业的经济效率。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工业进入了快速扩张

的阶段,工业产值1997年比1979年增加691.4%,高于国内生产总值为450.2%的增长(同比价格计算)。^①轻工业1979年与重工业之比为43.7:56.3,1997年则为49:51,计划经济时期工业结构失衡现象得到改善。^②改革开放以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让中国经济告别短缺。据国内贸易部1997年下半年对613种主要商品供应情况的排队,供不应求的商品有10种,仅占1.6%,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占66.6%,供过于求的商品占31.8%。^{[25](p.950)}

四、“买方市场”下工业大国的形成 (1998—2012)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内需不足”成为困扰中国工业发展的重要问题,1997年下半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又对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在“买方市场”下,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刺激工业增长,这一时期重化工业发展迅速,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一)扩大内需的努力与重化工业发展

为克服内需不足、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1998—2004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相当一批国债项目集中在基础设施投资,有效刺激了工业需求。2008年为应对世界经济危机,中国政府再次进行了4万亿的投资。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家4万亿投资中基础设施、灾后重建、保障房等项目将拉动2亿吨粗钢需求。^[26]

为扩大内需,我国政府还积极推动城镇化与房地产业的发展。1998年城镇化率为33.35%,2012年上升到52.57%。^{[27](p.95)}城镇化的推进有效刺激了包括房地产在内的国内需求增长。房地产业由于其产业关联性强,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产业,有效刺激了重化工业的发展。1998—2009年,钢铁产值中建筑业的需求高达59%。^[28]

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进一步扩大内需,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提出了“西部大开发”

战略。江泽民明确提出“西部大开发”“有利于扩大内需、进一步启动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市场”。^{[29](p.105)}党的十六大以后,中央还陆续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对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大规模投入有效拉动了钢铁、水泥、工程设备等重化工业的增长。

(二)加入WTO与“世界工厂”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市场逐渐饱和,中国加入WTO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了对市场与资源的“两个利用”。在更为开放的环境下,中国的低成本优势(尤其是劳动成本优势^③)得到进一步凸显。2000年中国出口额位居世界第7,2009年上升到世界第1位,尔后长期保持这一位次。2000年中国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仅为3.9%,2011年上升为世界的10.4%,^{[30](p.518)}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三)新型工业化的探索

面对国际上信息化的浪潮、国内人均资源不足与外延式工业化之间的矛盾,我国这一时期还进行了新型工业化探索。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31](p.21)}胡锦涛强调:“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32](p.177)}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政府选择了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等七大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重点扶持。新型工业化还对工业如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进行了探索。

1998年以后,我国有效克服了“买方市场”下的内需不足对工业发展的制约,成功抵御了两次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保持了工业较快增长速度。从工业生产总值^④来看(按照现价美元计算),中国1998年为美国的22.8%、日本的34.8%、英法德之和的35.2%,2007年中国超过日本,2008年超过英法德三国总和,2011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从工业内部

①课题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相关数据计算。

②笔者综合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③2003年中国工人的小时平均工资(包括福利)只有0.8美元,分别相当于泰国的40.8%、马来西亚的38.3%、巴西的29.1%、韩国的8.0%、法国和英国的4.5%、加拿大的4.3%、日本的3.9%、美国的3.7%、德国的2.6%。参见吕政主编:《国际产业转移与中国制造业发展》,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④国际工业增加值的比较所用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其工业统计口径更广,其与ISIC第10—45项相对应,并包括制造业(ISIC第15—37项)。其中包括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电力、水和天然气行业中的增加值,大于我国工业的统计口径,相当于我国第二产业的口径。

结构来看,1998年以后工业快速发展又具有重工业重启的特征,1998年重工业占工业比重为50.2%,2000年达到60.2%,^①2006年则为70%,尔后长期保持70%以上的水平。^②

五、“经济新常态”下工业大国的转型升级(2012—2019)

随着2012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结构与动力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成本不断提升,资源、能源、环境压力不断增大,自主创新不足背景下,我国积极推动了工业的转型升级。

(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中国制造2025”

2015年习近平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重要抓手。“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短期看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钢铁工业的“去产能”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2013年钢铁产量达到7.79亿吨,占全球粗钢产量近50%,存在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工业和信息化部向各地下达2014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目标任务,截至2016年12月21日,全国压减炼铁产能4629万吨,转炉产能9749万吨。钢铁行业已由2015年的全行业亏损转变为全行业盈利。^{[33](p.435)}

为实现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我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选择10大优势和战略产业作为突破点。^④按照“中国制造2025”的部署,中国工业将分三步走:第一步,2020年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2025年中国进入世界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中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全面实现工业化;第三步,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34](pp.10-11)}

^①2000年与1998年工业统计口径有变化,2000年与1998年重工业占工业比重不可比,但2000年与2006年具有可比性。

^②笔者综合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及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

^③十大重点领域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业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④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畅想。同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二者共同构成了“一带一路”重大倡议。

(二) 释放大国开放红利与工业发展

新时代我国积极推动了新一轮对外开放,通过“一带一路”“自贸区”建设等重大举措,释放大国新的“开放红利”,为工业发展创造了更好的外部环境。

1.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工业发展

习近平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①“一带一路”重大倡议^②构建了拓展国际交流的重要平台,形成了中国更广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机制。“一带一路”贯穿欧亚大陆,许多沿线国家自然资源丰富,“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为中国工业发展提供更丰富的资源、能源,有效缓解国内资源品上升的压力。例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原油供需分别约占世界总量的1/2和1/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天然气产量约占世界总量的50%。^{[35](pp.269-270)}而且许多“一带一路”国家基础设施薄弱,我国通过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与联系,可以有效化解国内过剩产能。据测算,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涉及2.6万公里的高铁,预期将消耗8580万吨钢。^[36]

2. 自贸区与中国工业升级

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挂牌启动。国务院批准的上海自贸区,推行贸易自由化、投资的自由化、金融国际化、行政的精细化。^[37]上海自贸区范围进一步扩大,2015年扩区后的上海自贸区以十分之一的面积创造了浦东新区四分之三的生产总值,以五十分之一的面积创造了上海市四分之一的生产总值。^[38]2015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广东、天津、福建设立自由贸易区,2016年进一步在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湖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新设七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一方面,自贸区的建设将让我国以更为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自贸区向内地推广,在主动开放中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为我国内地工业转型升级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虽然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工业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但与世界其他大国相比,中国工业增长仍然强劲。中国2012年工业

生产总值比美国、日本、英法德三国之和分别高 20.5%、133.6%、100.5%，2017 年则高了 38.8%、247.6%、152.3%。^①在工业保持中高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工业的质量和效率与世界工业强国相比仍有差距。

六、大国视角下新中国工业发展的逻辑与启示

回顾新中国 70 年工业发展的历程，我们认为我国工业发展体现出了自身的逻辑与特点。未来要注重发挥大国优势，实现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升级。

一是大国国情要求中国建立完备的工业体系。近代中国百年落后挨打的历史一再证明，作为后发大国，要屹立世界强国之林必须要有强大的重工业为支撑。而重工业发展一方面存在较高的投资门槛，另一方面对技术要求较高。但是大国从人均的角度来看，重工业门槛性的投资相对较小；而且大国内部的技术模仿、扩散成本往往又要小于国家之间的成本。经过 70 年的努力，我国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与强大的国防工业。当前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生产联合国产业分类中 39 个工业大类、191 个中类、525 个小类的国家。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工业分工模式从旧有的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转变。当前中国工业亟需在核心技术领域、生产的关键环节进行突破。未来一方面应当挖掘大国工业体系的独特优势，挖掘国防工业的技术优势，实现大国内部的技术扩散；另一方面还应当发挥大国优势，突破工业发展的技术瓶颈，延伸工业价值链，提升我国工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是发展中大国特征使得中国工业化具有赶超的特点。经过 60 多年的努力，中国 2011 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基本实现了中国工业数量上的赶超。习近平指出：“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39](p.30)} 尤其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在新一轮大国工业竞争中实现工业质量与效率的赶超，应当成为未来工业发展的中心任务。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工业化赶

超的独特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可以很好整合大国资源，推动工业化；对外则可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为工业化提供稳定的环境。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39](p.36)} 未来要实现中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就离不开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我国应当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汇聚大国合力，突破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工业技术升级的围堵，实现新时期中国工业质量与效益的赶超。

四是中国工业发展需要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双重作用。中国工业发展道路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也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改革开放前，在政府主导下优先重工业发展，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之后，通过引入市场的力量，为中国工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实现了工业数量的赶超。从历史经验来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工业发展不同阶段不断进行调整的。要实现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变，应当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未来实现工业大国的转型升级应当注意：第一，政府应当加大基础性的科技研发、人力资本建设的投入，夯实自主创新的基础；第二，构建以企业为主导的创新网络，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第三，政府还应当鼓励企业对于技术前沿的探索，分担企业创新的风险；第四，进一步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让资源、能源等要素价格更好反应供求关系，倒逼工业的转型升级。

五是大国工业发展要注重区域之间的公平与效率统一。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之间工业发展长期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工业化中的区域差距拉大不仅不利于激活大国消费潜力，也不利于民族团结与国家稳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政府将投资更多集中在内地，但沿海地区的优势未能显现出来，制约了全国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开放，工业取得较快发展，但区域差距拉大。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以来，我国进行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协调战

^①笔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计算。

略的探索,但是区域发展不协调仍然是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表现。随着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工业成本的不断升高,中国应当发挥大国独特的空间回旋优势,挖掘大国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未来一方面应当以市场纽带,破除隐形壁垒、打破行政分割,推动区域间工业的合作,另一方面应当通过“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等重大战略推动区域间工业协调发展。

六是发挥大国独特的政治优势,为工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新中国工业70年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工业化离不开世界。中国大国国际地位影响着国际格局,国际格局又对中国工业化有着影响。当前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我国与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之间的摩擦和碰撞增多。习近平指出:“我们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39](p.213)}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我国应当发挥大国在国际舞台中的政治优势,为工业转型升级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今后,首先,我国应当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突破,通过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40]其次,我国应发挥大国政府的政治优势,为工业“走出去”保驾护航,化解中国资本的海外风险。再次,我国还应当发挥大国优势,在国际规则中形成更大的话语权,为提高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17-10-28.
-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文集(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4]梁进社.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瓶颈与环境约束[J]. 经济研究参考, 2011, (1).
- [5]肖翔, 武力. 大国视角下中国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方式演变研究[J]. 教学与研究, 2015, (1).
- [6]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8-12-19.
-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 [8]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编. 1953—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工业卷)[M]. 北京: 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8.
- [9]李定. 当代中国的物资流通[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 [10]武力. 1949—1978年中国“剪刀差”差额辨正[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1, (4).
- [11]张柏春. 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 1949—1966[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4.
-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13]吕政, 黄速建.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30年研究[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
- [14]汪海波. 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M].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2010.
- [15]张启华, 张树军. 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发展史(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 [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6.
-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 [19]江泽民文选(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20]成致平. 中国物价五十年[M]. 北京: 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8.
- [21]唐任伍, 马骥. 中国经济改革30年(对外开放卷)[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8.
- [22]傅自应. 中国对外贸易三十年[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8.
- [23]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司. 对外经济统计年鉴(1998)[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 [24]邓小平会见香港核电投资有限公司代表团时的谈话[N]. 人民日报, 1985-01-20.
- [25]武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M].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0.
- [26]陈瑜. 中国钢铁行业2009年下半年有望转暖[J]. 重型机械, 2009, (2).
- [27]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13)[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3.
- [28]张嘉麟, 瞿宛文. 中国钢铁业近年来高速增长之成因[J]. 世界经济文汇, 2014, (4).
- [29]江泽民文选(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 [30]国家统计局贸易外经统计司. 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13)[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3.
- [31]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32]胡锦涛文选(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 [3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2016—2017)[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 [34]中国制造2025[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 [35]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 中国石油产业发展报告(2018)[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 [36]杨婷. “一带一路”倡议下绿色钢铁产能合作路径探讨[J]. 冶金管理, 2018, (9).
- [37]范恒山. 十八大以来我国区域战略的创新发展[N]. 人民日报, 2017-6-14.
- [38]蒋媛媛.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的上海自贸区发展与全球城市建设[J]. 上海经济, 2017, (7).
- [3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 [40]黄先海, 余骁. 以“一带一路”建设重塑全球价值链[J]. 经济学家, 2017, (3).

责任编辑: 景 怡

Relevant Issues of the Important Strategic Opportunity Period for China's Development: The Key Lies in Doing Well in Domestic Reform,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China is still in an important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while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ex.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do our own thing well. From a problem orient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and urgent issues at present in China are: first, enhancing the Party'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as the core; second,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s the foundation; third, firmly grasp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ideological work; fourth, effectively doing a good job in the central task of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fifth, making necessary preparations for military struggle. To raise these issues to the top-level thinking, we must adhere to the guidance of Marxism, the socialist road, the people-centered orientation, and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Li Shen-m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s Leading Core and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PC in the New Era: The new situation and problems faced by the CPC in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ruling position of the Party, and the challenges to its ruling in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determine the Party must have a high degree of authority.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s leading core and that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have inherent unity. The major to-be-studied issues of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include how to effectively play the key role of the Party's leading core in adhering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nd centralized and unified leadership, how to standard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s leading core and the Party's central leading group, and how to ensure the Party's leading core always leads the Party in the correct political direction.(Huang Wei-li)

Adhering to "Two Unshakable"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With a Concurrent Commentary on the Neutrality of Ownership: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emphasizes we should unwaveringly consolidate and develop the public economy and unwaveringly encourage, support and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n-public economy. This expla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ownership economy and non-public ownership econom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points out adhering to "two unshakable" is the inevitable choice and basic polic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conclusion that China is still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socialism, it is objectively necessary to adhere to "two unshakable" in the new era.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economy, private economy and other kinds of ownership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is also an integral part of achie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Recently, the neutrality of ownership has been hotly discussed. It is wrong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conomy by restricting the state-owned economy, which deviates from the foundation of our constitution and Marxist economic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by upholding and consolidating "two unshakabl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and opening up, better meet people's growing needs for better life, accelerate the building of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Zhang Jia-xin and Wang Qing-qi)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Researches and Prospects: Since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a series of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with President Xi Jin-ping as its core have aroused extensive discussion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Scholars have made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historical orientation a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evaluation and monitoring, key "shortboard" and realization path of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However, the current researches on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still need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to broaden their horizon, deepen the contents in a multi-dimensional way, and promote the structural balance in the adoption of researching methods.(Jiang Ming-min and Wang Yi-yuan)

From Mao Ze-dong to Xi Jin-ping: Leaders' Original Aspirations and the Seventy-Year PRC: The year of 2019 is the 98th anniversar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PC and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On the occasion of double anniversary, it is necessary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original aspirations of the CPC core leaders from Mao Ze-dong to Xi Jin-ping and how the PRC stands up, becomes rich and grows strong. When New China was founded, Mao Ze-dong's original aspiration can be summed up as building an independent, democratic, peaceful, unified and prosperous new country and jumping out of the historical law of periodic recurrence between order and disorder, which made New China stand up; Deng Xiaoping's original aspiration as the prosperity and wealth of the motherland and the well-being and happiness of the people, which made the Chinese people rich; Xi Jin-ping's as the realization of a better life for the people, which made the Chinese nation strong. Xi Jin-ping constantly sticks to his aspiration and perseveres in realizing it, which brought about a new situation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and led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o a new era.(Shi Zhong-quan)

A Review of New China's Seventy-Yea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Great Power: Based on its national conditions as a great power, New China has made seventy-year exploration on industrialization, which completed China's transformation from a big agricultural country to a big industrial country. In the future, China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to upgrade from a big industrial country to a great industrial power. Reviewing the seventy-year history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New China, we can draw up unique logic and enlightenment: China as a big country requi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plete industrial syste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large developing country make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catch up;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unique advantage of the industrial catch-up; China'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ntails the dual function of government and market; we should properly handle the relations between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mong regions, and pay attention to making good use of the unique political advantages as a big power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to create a favor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Xiao Xiang and Wu Li)

The Establishment, Development and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New China's Industrial System: The industrial system is a strong support for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have a complete industrial system. Despite a low starting point of China's industri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setbacks through its development, the whole n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has basically built an independent, comprehensive and complete socialist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n less than 30 years through arduous efforts and struggles. The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of China's industrial system construction in the 30 years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re in sharp contrast to those of old China and those of the major capitali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system in the 30 years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as laid a solid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economy,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past 4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Yang Yan)

Urban 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in New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Shanghai Satellite City Between the 1950s and the 1960s: In the 1950s and the 1960s, facing the imbalance between national demand and industrial layout and the lack of integration, New China gradually established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giving prior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heavy industry" on the basis of learn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Soviet Union. Shanghai is the national center of industry and economy,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nstr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satellite city upgraded Shanghai from a centralized and single structure city to a conglomeration city, and paved a road of in-depth integ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Shanghai and China. The features of this road are as followed: resolutely obeying and serving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and making full use of its superior conditions for dislocation development; actively transforming and upgrading to "advanced, refined and cutting-the-edge" development to build the city through industry; promoting industry through city construction, and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Xin Ping and Tao Xue-song)